

## 忆黄润华先生

□ 庄秀芬 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

我2007年进入国家图书馆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参与的第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评审。我负责民族文字古籍评审小组的联络工作，黄先生担任评审小组的副组长，由此开始了我与黄先生16年的师生情谊。特别是我2009年租房与黄先生同一栋楼住，和黄先生接触日益增多，他的谦逊儒雅的形象，严谨认真的治学态度令我受益匪浅。回忆起来，仿佛有说不完的话题，我仅讲几个印象最深的事。

### 一、开展全国满文文献存藏情况调研

2011年8-9月，文化部开展对全国收藏满文文献典籍较多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和教育、宗教、民族、文物等系统的古籍文献收藏和保护状况进行调研。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承担了这次调研任务。当时在全国分了三个调研线路，我有幸全程参与。黄先生参加了新疆、内蒙古和北京地区的调研工作。记得去新疆的时候，飞机落地乌鲁木齐，我们放下行李就奔赴调研单位开展工作，由于有时差，晚上很晚才睡觉，第二天再转赴伊犁。全程时间紧、考察单位分散，令我心里十分不安，生怕累坏了老先生。但黄先生没有说一句埋怨的话，把精力都放到所看的满文古籍上；在内蒙古的调研中，由于有些单位不是一个系统，我们去的时候一再推脱没有馆藏目录，黄先生就耐心地帮我和他们解释，最终得以了解到他们的真实存藏情况；在北京存藏的调研中，很多单位没有整理满文古籍的专业人员，黄先生每到一单位，都会和他们说：“如果需要编目人员，我可以帮你们做。”

调研中，我注意到黄先生几乎对每个单位的满文古籍都很熟悉，拿过一部书，他只简单看一眼就说这是某某书，我过去来看过，还问人家我看过的某某书现在哪里，能否给我找来看看。特别是在内蒙古社科院图书馆发现一部乾隆年间满文抄本《西游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发现雍正年间刻本《异域录》，令黄先生格外激动。调研结束后第二年，他又让我帮忙联系内蒙古，专程去内蒙古社科院图书馆看书，后来还写了一篇文章《〈西游记〉满文译本的新发现》。

虽然东北三省的调研黄先生没有参与，但我通过调研单位得知，多数公共图书馆黄先生都曾去看过书，还帮有些单位整理过满文古籍。我在齐齐哈尔图书馆亲眼看到了黄先生当年的编目签条，可惜当时没有拍照下来。我在感动的同时，也深深感受到黄先生当年编纂《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的不易。

可以说，满文文献调研工作的顺利完成离不开像黄先生这样的专家支持和鼓励，正是因为他们站在背后，我才克服一路遇到的各种困难，顺利完成这次调研任务。



图 1 在呼伦贝尔市档案馆调研



图 2 在内蒙古社科院图书馆调研

## 二、《满文文献知见录》的编纂出版

2015 年，黄先生和我谈起了想重新编纂满文文献目录的想法。一方面是因当年编纂《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时条件有限，著录的文献和单位不全，里面的著录也有些错误，另一方面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以来，发现了很多满文古籍，同时国外也陆续出版了满文古籍目录。重新整理存世满文古籍的藏量、种类、存藏单位等方面的条件基本成熟。黄先生希望在《全国满文图书资料联合目录》的基础上再补充、修订，提供给大家一个尽量全面的满文文献目录。

经过请示报批，2016 年 4 月，国家图书馆与黄先生、屈六生先生签订了《满文文献知见录》的委托编写合同。2018 年《满文文献知见录》初稿完成，我开始联系多家出版社，最终只有辽宁民族出版社（现辽宁民族出版有限公司）可以编辑满文书籍。经过多次协商，国家图书馆和辽宁民族出版社于当年 6 月签订了《满文文献知见录》出版合同，合同签完不

久，全国纸张涨价，原来签订的价格不能满足出版需要，应出版社要求又签了补充合同，减少了赠送样书的数量。

合同签订后，就开始了书稿的漫长修改过程。黄先生每次都把书稿发给我，我就和保护中心办公室管理组的同事一起看稿子，大家讨论提出修改意见，我汇总交给黄先生，当时的办公室主任林世田也和我们一起去看稿子提建议。黄先生每一次都虚心听取我们的意见，仔细修改书稿。书稿至2020年基本定型，但因疫情迫使出版速度不得不慢下来，期间又遇两位老先生身体不适，出版社编辑更换，出版书号过期重新申请等种种原因，最终《满文文献知见录》于2023年2月才得以与大家见面。黄先生终于完成人生最后一部学术著作。

### 三、在黄先生最后的日子

2021年初，我听闻黄先生爱子于2020年突然去世格外震惊，不知如何去安慰老先生。一次在路上偶遇，看着他已瘦的形销骨立，我很难受，但他只是和我说起《满文文献知见录》校稿的事，其他事一句未提。我只好嘱咐他说有事尽管和我们说，千万不要客气，但我知道，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的黄先生是不会因琐事来找我的。

《满文文献知见录》出版以后，我联系先生赠书事宜，他顺便告知我已经订票去广西看望93岁的姐姐，由于不会网约车，请我帮忙在出发日订一个出租车。我说可以在馆里订一个车送机，先生坚决不接受，无奈只好给约了出租车。后来先生4月回京还特意约我见面，给我带来老家小食品，让我汗颜。五一节日过后，我和爱人一起去先生家里探望，他与我谈了广西、无锡一路的见闻，精神状态很好，我以为先生的身体应该在慢慢恢复。接下来两个多月单位出差、办会，我没有再与先生联系。7月，保护中心举办《中华医藏》发布会，邀请史金波先生出席，史先生提出想去看看黄先生，我因感冒没有同去。同事郭晶陪同，回来后哭着和我说黄先生快不行了。我大吃一惊，这时才知道黄先生已经病入膏肓。随后和张志清常务副馆长、老干部处同事一起去看望黄先生。看到虚弱的他心里倍感难受，回来的路上忍不住流泪。

随后的周末，我再次去黄先生家里，看他没有力气说话，我仅停留片刻便离开。之后和他亲属保持联系，知他已经住院。8月6日，我和爱人去海淀医院看望他，他见到我们很高兴，还拱手表示感谢。这时他说话声音已经很虚弱，我要凑近仔细听才能听清楚，记忆力也出现问题，很多人的名字已经想不起来。他说很怀念和保护中心一起工作的日子，退休后是他学术研究的开始。但有两件事心里一直很内疚，一件是名录评审中有一部古籍的版本鉴定错了，还有一件是有一次参加中心的会议，因为太累中午在家睡过头迟到了。还嘱咐我把《满文文献知见录》送给几个人。我临走时说下周再来看他，他说希望还有再见面的机会。8月9日出差，返程因飞机晚点于11日凌晨2点多到家。本想第二日再去看望黄先生，没想到先生已经于当日离我们而去。前面一见成为永别。

我们办公室的同事都说，黄先生是一个讲究人，他无论对谁都是谦逊有礼，从不愿给人添麻烦；他做事认真、做学问严谨，他的身上体现了老一辈学人的风范，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今日，我们送别先生，愿天堂也有图书馆，愿先生能在天堂护佑古籍世代传承。